

11.01

杭州文史资料

第一辑



政协杭州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

前 言

《杭州文史资料》第一辑今天和大家见面了。

早在一九五九年，周恩来总理就动员各界人士行动起来，抓紧时间“抢救”史料，并指出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的重要工作之一，它可以补书刊文献之不足，是我国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我们遵循周总理的倡导，开始进行了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，把征集的史料提供全国政协和浙江省政协采用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，更须承前启后，继往开来，进一步把文史资料工作搞好。为此，我们相应地成立了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并积极开展工作，在中共杭州市委的领导和关怀，各民主党派、工商联，以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，工作是顺利的，成绩是可喜的。在此对热情支持我们的同志表示感谢！

在党的十二大精神的教育鼓舞下，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文史资料工作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部分，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部分，是一项既重要又迫切的工作，必须抓紧搞好。但是由于我们马列主义水平低，历史知识不足，兼以对史料的编辑缺乏经验，《杭州文史资料》第一辑的编辑出版，必然有不足之处，以求教于高明。

我们认为，文史资料的编写，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，要求“存真，求实”，这是我们搞文史资料的原则和指导思想。根据人民政协的特点，我们要求大家对这个刊物在掌握原则和重点，以及编排的形式与内容等方面，多多提出意见、建议，以便改进工作，在提高编辑质量上作出努力。

常言说得好：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。我们的文史资料工作，一定要依靠各方面的力量才能办好。我们不仅要求革命老同志动起手来，还要求各民主党派、工商联，以及各界人士都动起手来。我们认识到编写史料必须用对立统一的思想作指导，编写的面要广，要写事物的各个方面，在“存真、求实”的原则下，允许多说并存，可以不拘体裁风格，大胆放手的写下来。

我们希望得到各界人士进一步的支持帮助！让我们一起在十二大精神的指引和鼓舞下，努力为我们的文史资料工作开创一个新局面。

**政协杭州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**

一九八二年十月

目 录

前 言

杭州的兴起与发展·····	林正秋(1)
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杭州市党部·····	汪坚心(24)
解放前的三青团杭州区分团·····	王仲高 谈 冲(35)
国民党杭州市参议会始末·····	徐福三(41)
杭州消防简史·····	丁鉴廷 吴石经(60)
解放前杭州官方的救济院点滴·····	汪坚心(69)
辛亥革命前夕杭州的近代教育·····	洪昌文(72)
解放前杭州市的地方教育·····	锺伯庸(79)
“浙一师学潮”的前前后后·····	董舒林(101)
解放前杭州市学生运动中“文协” 的活动·····	斯宝昶(132)
浅谈茶叶·····	吴乐勤(136)
杭州翁隆盛茶号的兴衰·····	郑志新 邵义彬 吴乐勤(145)
杭州高义泰布庄简史·····	董涤尘(153)
杭州银楼业沿革·····	袁祖扬(164)

杭州的兴起与发展

林 正 秋

杭州，是东海之滨的一座著名城市。她历史悠久，是我国六大故都之一。她的西面是景色秀丽的西子湖，东面是气势雄浑的钱塘江。唐宋以来，游人如织，佳话频传；而今，她又成为浙江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交通中心，世界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。

原来这个美丽的城市，竟是一个与浩淼大海相连的浅海湾发展而成的。本文作简略的叙述。

一、原始聚落的出现

远古时候，今天的杭州城区和西湖，是个浅海湾；西湖南北的群山，也大部埋在海底，唯有峰顶露出水面，成为一个个小岛。北面的北高峰、老和山和南面的凤凰山、吴山等向东突出，成为大海中的两个海峡，整个海湾呈马蹄形。

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在杭任地方官时说：“杭之为州，本江海故地”。住在杭州癸辛街的南宋词人周密，当年到城南吴山青衣泉，看见山腰石壁上有水波细纹的遗迹，曾说：“今之城市，当在深水底数十丈矣。”解放后，地质工作者亦在城北拱宸桥一带勘探获知，距离地面三十到五十公尺以下的松散沉积

物有海滨生物。这都是雄辨地证明：今天的杭州地区，在远古时确是一个海潮涨落的浅滩。

大约到了距今四、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，今杭州城的西北一带已有原始人类活动。从考古发掘证明，从今西湖北首的老和山麓，经过古荡、勾庄、水田畝，向西北延伸，直至余杭之良渚、瓶窑、安溪等处，都发现有原始人类生活的遗址与遗物，考古学上通称为“良渚文化”。

“良渚文化”，是一九三五年于良渚镇附近发现的一个文物丰富、兼具自己文化特征的原始人类活动遗址。从出土文物考证，那时人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，栽培粳稻、糯稻、也兼渔猎、畜牧、采集野生植物。手工业以黑陶和玉器最为著名。

老和山遗址，是离开杭州旧城最近的一个原始村落，距今西湖仅一千五百公尺。一九五三年营建浙江大学新校舍时，建筑工人在山麓发掘出许多新石器时代的文物，有石器、陶器、玉器等残片二千余斤，其中有砍劈用的石斧、石磷、割切用的石刀，狩猎用的石箭头，纺织用的石沙轮，缝制衣服用的石针及装饰用的玉器等。老和山高约二百米，附近山岗蜿蜒、溪沟纵横，依山临水，成为旧城区最早的原始村落。

水田畝遗址，位于今半山火车站的南面。出土文物丰富多采，有犁、铤、斧和刀等石器农具与大量水稻、芝麻等作物种子，这是已经过渡到农业经济相当发达的新石器末期的证据。从遗址推断，当时的人们已开始在地面上构建房屋，这些房屋面积虽然狭小，但和中原地区的半穴居房屋不同，它适应地势低洼的南方。

从水田畝文化层的上、下两层分析，它的形成时间较长。下半部分有较多的黑陶、夹炭陶，属良渚文化时期；从上半部

文化层中的麻布纹、米格纹陶器看，则已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春秋战国时期。

相传大禹治水之时，全国分为九州，杭州属于古扬州之域。大禹治水成功后，大会诸侯于会稽山（在今绍兴市），曾在今杭州地方“舍杭登陆”（“杭”就是古代航船的别称，舍杭，即离开船的意思）。因此，后人把此地叫做“禹杭”。禹与馮音近，而讹为馮杭了。从大禹治水的夏代到春秋时期，杭州为越国故地。战国时，越国为楚国所灭，杭州又纳入楚国版图。

二、魏晋前的钱唐故县

杭州的前身是钱唐，是秦统一后设立的一个县，它是会稽郡的二十六属县之一，地处武林山麓。

为了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，秦始皇开辟了一条从咸阳通往会稽的驰道。公元前二一〇年，他巡视东南，由于无法渡过那风涛险恶的钱塘江（时称浙江），只好向西再走一百二十里，从“狭中渡”，这是“钱塘”之名第一次见于史书的记载。后来，唐代陆羽在《武林山记》中说，在宝石山麓还有块缆过秦始皇航船的巨石，被人称为“缆船石”。

到了西汉，钱唐仍属会稽郡，但它的地位逐渐重要起来。汉武帝元狩年间（公元前122—公元前117年）还把会稽郡的西部都尉治（即郡一级的治安的军事机关）设在钱唐县的武林山。王莽改制时，把全国政区的地名作了大改变，钱唐改为“泉亭”。东汉建立后，又恢复钱唐旧名。顺帝永建四年（公元129年）开始以江为界，把会稽郡一分为二，江以北增设吴郡，

治所设在今江苏省苏州市，江以南仍属会稽。钱唐县从此也就划归吴郡。

秦汉时期的钱唐县址，史书众说纷纭，《水经注》说：“浙江东迳灵隐山，下有钱唐故县”；清人倪璠在《神州古史考》中考证，说：故县址范围大致是：南至五云山麓的江边徐村、范村（即梵村）一带，西北至栗山石人岭西和溪，东到宝石山麓的大佛寺附近。这一带环绕灵隐、天竺等南北诸峰（汉时通称为武林山），是个山中小县。

三国、两晋和南北朝时，北方连年战争，人民大量南迁，给长江以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，大大促进了钱塘江流域的开发与航运业的发展。钱塘江下游的城市码头迅速增加，著名的有同浦、柳浦、黄山浦和樟林珩等五、六处。可是，钱塘江怒潮却时常吞噬两岸居民的生命财产，成为钱唐县最大祸患。南朝时有位钱唐县令刘道真写了一篇《钱唐记》，其中记有一件饶有风趣的筑塘故事：汉末一位郡议曹（郡守的属官）名叫华信，召募县民，如能挑土一斛到江边，即给铜钱一千。旬日之间，来者云集，塘将要堆成时，狡猾的议曹却变了卦，说不给钱了。于是，远道挑土的县民，个个面带愠色，把土倒于此地便悻悻而去，海塘就这样堆积而成，故名“钱塘”。这条海塘的兴筑，对防御潮患，保护县城的经济发展曾起了积极的作用。

公元四八五年，南齐爆发了唐寓之领导的农民起义，起义军从富阳攻克钱唐县后，建立农民政权，国号“兴平”，不久，南朝萧梁政府（公元五〇三——五五七年）又将钱唐县升为临江郡，到陈代（公元五五八——五八九年）改临江郡为钱唐郡。从此钱唐县就成为郡治所在地。县的范围也沿钱塘江扩

展至凤凰山麓的江干一带平陆。

三、隋唐时期杭州的繁盛

隋开皇九年（公元五八九年），文帝杨坚灭陈，结束了东晋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，废除钱唐郡，建置杭州。杭州之名从此出现于史书。钱唐，成了杭州的属县。不久，州治从余杭迁至钱唐，又把原来的新城（今富阳新登镇）、海盐也并入钱唐，扩大了县境，对杭州成为一个城市，起了奠基作用。此外还有两件事：一件是开皇十一年（公元五九一年），隋大臣杨素调发民工依凤凰山筑起州城，周围三十里九十步。城垣的兴建，有利于都市的安全与经济的发展。第二件是隋炀帝大业六年（公元六一〇年），以杭州为南端终点的大运河竣工通航。运河全长四千多里，以洛阳为中心，北起涿郡（今北京）南迄余杭（今杭州），沟通了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与钱塘江五大水系，对我国南北航运的畅通有重大的历史意义。

到了唐代，杭州始属江南东道，后隶浙江西道。肃宗时，又在杭州设立了浙东防御使；昭宗时升为大都督府。杭州的属县钱唐的“唐”字，因避讳，加土旁变成“塘”。钱塘之名一直沿用至辛亥革命那一年。

杭州进入全国著名城市行列，应该说是唐朝三百年有了新的发展。如唐代少府监把全国的绢布按质量好坏分为九等，杭州所产的绉（苧麻织成的粗布）列为第四等。杭州所产的绫，还受到大诗人白居易的称赞，他在《杭州春望》一诗中，有：“红袖织绫夸柿蒂”之句，就是称誉杭州女工织造的有柿蒂花纹的绫。此外，杭州造船业也有较大的发展，民间已能制造三

丈长的大船，船体规模和工艺水平，均与当时著名的造船业中心苏州、扬州不相上下。店肆三万余家，每年商税收入达五十万缗，约占全国商税总收入的百分之四。

那时杭州的兴盛，还表现在城区的扩大与人口的增加上。唐代时城区从原来的城南江干一带向北延伸到武林门，城南江干成为海外贸易的码头。城北武林门一带，则因大运河的通航而成为附近州县货物的集散地。人口迅速增加，据《乾道临安志》载，隋时，杭州一郡仅一万五千户，以一家五口计算，整个杭州地区也只七万余人。到了唐代贞观年间（公元六二七——六四九年），增至三万五千户；至开元年间（公元七一三——七四一年），更增加一倍有奇，达到八万六千余户。据李华《杭州刺史厅壁记》载，杭州于晚唐之时，已成为“咽喉吴越，势雄江海”的东南名郡了。

唐代杭州的繁荣，当然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含辛茹苦的建设成果，但也不能抹煞当年几任名刺史的功绩，他们至今受到人们的崇敬。

袁仁敬，是公元七二五年由唐玄宗亲自选任的杭州刺史。在他任职的三年中，为杭州人民做了一件至今被称颂的好事，即从洪春桥至灵隐、天竺的九里长的一条大道两旁，各栽三行松树，每行相隔八、九尺。松树长成后，这一带苍松夹道，绿树成荫，后人美称为“九里松”。直到元朝，“九里松涛”仍是钱塘十景之一。

李泌，代宗（公元七六二——七七九年）时任杭州刺史。由于当时杭州城池靠近江海，经常受到钱塘江潮的冲击与侵蚀，地下水咸苦难饮，城之西北一带居民吃水成了严重问题。当李泌发现西湖之水清淡可口时，就发动居民在杭州西北一带

开凿了相国井、西井、方井（俗称四眼井）、白龟池、小方井（即六眼井）和金牛井等六口大井，引西湖水入井，至今，在杭州最热闹的解放路井亭桥口，还立碑护井，以供后人凭吊李泌相国井故址。它解决了居民的饮水问题，又促进了城区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繁荣。

唐代伟大诗人白居易，于长庆二年（公元八二二年）任杭州刺史，了解到杭城东北至海盐一带经常闹旱灾，数千顷良田的收成没有保障。他冲破地方官员和豪绅中保守势力的阻力，决定发动居民兴筑一道从钱塘门外的石函桥至武林门的湖堤，扩大了钱塘湖（俗名西湖）的蓄水量，以利干旱时灌溉农田。那时，钱塘湖比现在的西湖大一倍多，湖堤筑后把钱塘湖一分为二，堤之西为上湖（即今之西湖），堤之东为下湖（今已湮为市区），尽量将水蓄于湖上，并设立水闸，调节水位，努力保证钱塘、仁和、盐官诸县数千顷农田的灌溉。堤成之后，白居易特地立了一块名为《钱塘湖石函记》的石碑。这条湖堤的兴筑，不仅对人民的生活与农田灌溉起了积极作用，而且于西湖的美化也有重要关系。人民为了深切怀念这位白刺史筑堤的功绩，故取名“白堤”，成为西湖胜景之一。

岁月流驶，沧桑变易，白居易所筑的“白堤”，后来变成市区的一部分，真正的白堤再也无处觅踪了。为了纪念白居易，人们又把从断桥至西泠桥的这条“白沙堤”改名为“白公堤”，简称“白堤”，并在孤山之麓建筑了白公祠，以志纪念。

四、吴越国的西府

公元九〇七年唐亡，后梁建立，五十年间，军阀混战，史

称五代。各地相继建立了十个割据小国。钱镠建立的吴越国，便是十国之一。

钱镠（公元八五二——九三二年），杭州临安县人，盐贩出身，在镇将董昌手下当一名小军官，后升为杭州都指挥使，镇海、镇东军节度使，掌握军事实权。又并吞了其他地方割据势力，扩大了地盘，于后梁龙德三年（九二三年）正式接受了后梁的册封，当上了雄据两浙的吴越国王。

吴越国地分十三州，定都杭州，加名西府，亦称西都。这是杭州作为帝王之都的开始，在杭州城市发展史占有重要的一页。

在吴越国统治时期，正如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《有美堂记》里所说：“钱塘自五代时，不被干戈，其人民幸福富庶安乐。十余万家，环以湖山，左右映带，而闽海商贾风帆浪泊，出入于烟涛暮霭之间，可谓盛矣！”

以前，钱塘江两岸大都分属两个行政区：如东汉、六朝时期，西北岸属吴郡，东南岸属会稽郡。西北岸的中心在吴（今苏州），唐代后期，江南东道（包括今苏南、浙江、福建）的治所便在苏州；而东南岸的中心又在会稽（绍兴市）。杭州自建立为吴越国的都城，一跃而成占两浙十三州的吴越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和文化中心。这就使杭州的发展起了重大的变化。

吴越国正式建立之前，钱镠为巩固统治地盘，对杭州旧城已进行过两次扩建。第一次是唐昭宗大顺元年（八九〇年）九月，“筑新夹城，环包家山，洎秦望山而回，凡五十里，皆穿林架险而版筑焉。”当时杭州城南群山相连，林木茂密，阒无居民，所以筑城墙还须“穿林架险”。经民工们三个月的努力劳动，于年底竣工。第二次是唐昭宗景福二年（八九三年），

钱镠亲率十三都兵与民夫二十余万人，扩建罗城（外城），东南沿江，西濒钱塘湖、霍山，西南至六和塔，东北至艮山门外范浦，凡七十里。据《吴越备史》载：四周共开城门十个：朝天门，在吴山下，今镇海楼；龙山门，在六和塔西；竹车门，在望仙桥南；新门，在炭桥东；南土门，在荐桥门外；北土门，在旧菜市门外；盐桥门，在盐桥西；西关门，在雷峰塔下；北关门，在夹城巷；宝德门，在艮山门外无星桥。每一城门的建造都十分讲究。

闻名世界的浙江潮虽给下游增添壮观，然而也给当地居民带来了灾难。早在两汉时期，潮患已见于史书的记述。从城南秦皇山到今海宁约有十八堡的数十万亩田地，常常是“悉成江面，民不堪命。”唐代杭州刺史崔彦曾，在城之东南修筑过五里长的沙河塘，但由于规模较小，未能阻挡潮水的冲击。吴越建都杭州，潮患就成为影响吴越国的财政收入和政局稳定的重大课题了。公元九一〇年，钱镠发动民工在候潮门外兴建海塘。先在离岸二丈九尺的范围内，取罗山之大木，打桩六层，每层中间又充实装有石头的竹笼与泥土，交错密排，堆成泥塘，泥塘之外，植“混柱”十余行，以折水势。泥塘之内，再加石堤，使之坚固。这条从六和塔至艮山门的堤塘，由于民工的努力，只化了三个月就完成了。后人称这条海塘为“钱氏捍海塘”或“钱氏石塘”。随后，泥沙渐积，堤岸益固。同时，又凿平了钱塘江中的石滩（时称罗刹石），使江运畅通，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兴盛，“舟楫辐辏，重不见其首尾。”吴越国与日本、朝鲜等国均建立了贸易关系。总之，如《十国春秋》所说：“钱塘富庶，由是盛于东南。”

吴越钱氏大力倡导佛教，在他们当权的八十多年间，在西

湖四周兴建了昭庆寺、韬光寺、六通寺、云栖寺、开化寺等三百多个大小寺院。据《淳祐临安志》说：“东南塔庙之盛……自唐更钱氏，日增月益，不可遽数。”当时便有人把杭州称为“江南佛国。”建宝塔造经幢之风盛行。月轮山上的六和塔，宝石山上的保俶塔，钱塘江边的白塔和民间故事《白蛇传》相联系的雷峰塔（一九二四年倒塌）…等一百多座经塔多建于这一时期。石刻佛像，那时也很兴盛。保存至今的将台山和慈云岭上摩崖石龕像，造型完整优美，就是公元九四二年开凿的，像主就是吴越国王钱弘佐。石屋洞外的五百罗汉像，千姿百态，维妙维肖。烟霞洞正壁的三世主佛，胁侍像、十六尊罗汉、千官塔、孔雀明王等也是吴越国的艺术珍品。

五、东南第一州

公元九六〇年，赵匡胤建立了北宋王朝，太平兴国三年（公元九七八年），吴越国王钱弘俶献所踞西浙十三州之地归北宋，杭州隶属两浙路成为北宋的版图。在北宋时期，杭州的经济、文化、得到继续发展，成为东南沿海的大城市了。

在北宋前期，杭州人口增加了一倍。柳永（公元九八七——一〇五三年）在《望海潮》词中说钱塘有“参差十万人家”。据元丰年间（一〇七八年——一〇八五年）的《九域志》所载，彼时杭州人口已达二十万二千八百多户，超过江宁（十二万七百七十七户）、平江（十五万二千八百二十一户），成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。

远自中唐以来，杭州逐渐成为江南丝织业的中心。至道元年（公元九九五年），北宋在杭州设置“织务”，专门管理与

收购本州及附近的丝织品，每年收购绢数二十五万匹，占浙西七州三分之一强。《咸淳临安志》载，熙宁十年（公元一〇七七年）杭州的夏税是：纳绢九万五千八百三十一匹，紬（绸）四千四百八十六匹，绫五千二百三十四匹，绵五万四千两。崇宁年间（公元一一〇二——一一〇六年），宋徽宗曾命童贯置局苏、杭，仅织绣工匠即达千人，可知官营丝织业规模之大。雕版印刷也居全国之首。据王国维《两浙古刊本考》统计，“监本（国家标准本）刊于杭者，殆居大半。”哲宗时，福建泉州商人徐戡在杭州刻印《夹注华严经》等书，运往朝鲜等地发售，获利甚厚，后被地方官苏东坡所禁止。此外，杭州的酿酒，造船制扇等业都很发达。“天下酒官之盛，未有如杭者也，岁课二十余万缗”（苏东坡《奏开西湖状》）。城市商业十分繁荣，熙宁十年杭州的商税高达十七万三千八百贯，超过了江宁府（五万七千二百八十三贯）和广州南海郡（六万八千六百九十五贯）。

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江河运输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兴起。北宋端平二年（公元九八九年），在杭州设立市舶司，杭州成为北宋对外贸易港口之一。杭州知府蔡襄在《双门记》中说：“道通四方，海外诸国，物资丛居，行商往来，俗用不一。”描绘了当时港口一派繁忙的景象。在杭城近郊，江河码头，还形成了南场、北关、安溪、西溪、范浦、江涨桥、汤村、临平等八个卫星镇市，促进了物资的吞吐，成为杭州城市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补充。

北宋时期的历届郡守对西湖的疏浚与整治是相当重视的。如王济的：“增置斗门以备溃溢之患”，如郑戡的：“发属县丁夫数万辟之”。天禧年间（公元一〇一七年——一〇二一

年)杭州知州王隨在《放生池记》中称赞西湖说:“宝刹相望、繚岸百余寺,烟景可爱,澄波三十里;实二浙之佳,一方之上游也。”苏东坡任杭州地方官期间,又对西湖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、整理,并形成了苏堤,使西湖景色更加妩媚。总之,从五代至北宋,杭州已成为“乃四方之所聚,百货之所交,物盛人众”的大都会了。据《乾道临安志》载,嘉祐二年(公元一〇五七年),梅挚出任杭州太守,宋仁宗赠诗宠行,称赞杭州是“地有湖山美,东南第一州”。在这段时间,杭州人材辈出,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如:喻皓、毕升、沈括等和文学家、艺术家、政治家不少是活动或居住在杭州,均为杭州增添了光辉。

六、南宋都城临安府

北宋覆亡后,康王赵构登基于应天府(今河南商丘)为宋高宗,史称南宋。

南宋初年,由于金兵步步进逼,宋军节节败退,曾先后建行都于扬州、建康(今之江苏南京)、杭州、越州(今之浙江绍兴市)等地,建炎三年(公元一一二九年)升杭州为临安府。绍兴八年,(公元一一三八年)正式定都临安府,自此,杭州就成为南宋一朝的政治、经济与文化中心。

绍兴十一年(一一四一年)宋、金和议达成后,南宋统治者耽乐湖山,一座座宫殿相继在凤凰山麓矗起。到了南宋末年,经过一百多年的不断兴建,环绕凤凰山麓,北起凤山门、西至万松岭、东自候潮门、南到钱塘江边,方园九里的范围内,宫殿林立,楼堂层叠,亭阁斋台,不计其数。皇城四周各开一

门，东边为东华门，西面为西华门，北边称和宁门，南面为宫城正大门，称为丽正门。门有三重，都是金钉朱户，画栋雕甍，覆以铜瓦，镌缕龙凤飞翔之状，光彩耀目。大门之上还有城楼，巍峨壮丽。大门之外，左右排着红椽子，戒备森严，禁止随便出入。

在修建宫殿的同时，还扩建了杭州东南外城墙，南跨吴山，北到武门，左靠钱塘江，右近西湖，气势宏伟。四周开了十三个城门：东边有便门、候潮门、保安门、新门、崇新门、东青门、艮山门；西边有钱湖门、清波门、丰豫门（涌金门）、钱塘门；南边是嘉会门，北边是余杭门（武林门）。其中便门、东青门、艮山门等城门外，设有半月形的瓮城。城墙高达三丈，厚约丈余。

南宋的最高行政机关——三省六部，在今六部桥之东，靠近皇宫和宁门外北首。内有都堂、（政事堂）、思堂大型建筑，为三省（中书、门下、尚书）长官商议政事之地。都堂之东为枢密院，它是军事系统的最高官署。六部（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）就在三省、枢密院的南面，与省、院紧邻。三省六部，屋宇毗连，出入同途，今天的六部桥之东，方园数里，就是中央首脑机关的集中之地。

临安府署，由凤凰山东麓，迁往城西清波门北首的净因寺故址新建。内有中和堂、有美堂、清暑堂、简乐堂等二十余处建筑，规模相当宏大。府署内亦有花园，园内的香远楼，面临西湖，可以“平眺湖山，山光林影，密疏隐见。”楼侧为茶亭，亭前凿方型大池，旁置假山，山上多疏林修竹，景色宜人。据《宋史·职官纪》载“本府掌畿甸（京城所在地）之事，籍其户口，均其赋役，颁其禁令”。它管理一府九县的民政、